

沧桑文丛
主编 ■ 李辉

郭小川 1957年日记

郭小川 著
郭晓惠 整理

郭小川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主编 李辉

郭小川 1957年日记

郭小川 著
郭晓惠 整理
郭小林

CANGSANG WENCONG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小川 1957 年日记/郭小川著. 郭晓惠, 郭小林整理.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7
(沧桑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215-04662-1

I. 郭… II. ①郭…②郭…③郭… III. 郭小川
(1919~1976) - 日记 - 1957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8021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75 字数 191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沧桑文丛”总序

每个人都生活于沧桑之中。

沧桑是时间的流动。昨天、今天、明天，在流动中构成一个整体。如同一条河流的水，尽管来自不同山川，一旦流在一起，便浑然一体，无法将之一一分开。

沧桑也是空间的存在。同一个时刻，同样的阳光照耀下，或者同一场风雨之中，每个人都不会重复同样的故事，而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便使流动着的沧桑变得丰富起来。

对于每一个个人而言，在他的心灵世界里，沧桑便是时间与空间的结合。他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受着历史，他在空间的存在中感受着世界，或者说，两者从来就是一体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群体、抽象与具体的交叉渗透中，沧桑才赋予人的情感、思想、人生一种

沉甸甸的分量。

大概还没有别的时候,比走近世纪末并跨入新世纪门坎时更让人感到“沧桑”这个词的含义。似乎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更深切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与人生、社会的变迁。不管他处在什么历史位置,不管他的过去是如何走过,回首往事,抚摸流逝的日子,都将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对更多的读者来说,处在世纪转折时刻,历史的好奇心也将愈加强烈。他们知道,阅读他人的人生故事和昔日的历史场景,实际上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个即将成为过去的世纪是如何走过,在这个世纪的舞台上人们是如何出演着生活的戏剧,将成为一个长久的话题,把今天和明天的读者深深吸引。

主编一套“沧桑文丛”的构想,便在这种一种感受中形成。

“沧桑文丛”将以回忆录和传记为主,并适当选择一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日记、信件等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原状的作品。作者或传主不受其名望、地位、职业的限制,题材不受题材大小重轻的限制,风格也尽可能多样化。

不猎奇,不虚饰,历史的真实应该是“沧桑文丛”的灵魂与品格。

重要的当然在于,文丛中的作品,能够留下这个世纪的影子和声音,能够为下个世纪的人们,提供真实的历史

记录。我相信,真正具有历史价值的作品,才会受到读者的青睐,才是“沧桑文丛”这种类型的丛书的生命力之所在。

愿这样一套丛书,以它独有的姿态,伴随着读者走进新的世纪。

李 辉

1997 年 1 月 28 日

出版说明

应李辉先生之约,我们编辑了这部《郭小川 1957 年日记》。

郭小川 50 年代中后期曾担任过中国作协部分领导职务,他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旋涡。但是,参与整人绝非郭小川的荣耀,相反,我们今天可以从他留下的日记中看到,一方面,他的历史限定性决定了他曾是相当“左”的,用那时的流行话语批判起同志时也曾声色俱厉,并且由于真诚被某些权谋者蒙蔽利用过;另一方面,由于他所受到的人道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他在内心里又不无矛盾——每当极左的理论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时,他总有某种不安甚至因良心受到谴责而痛苦。所以他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以“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办法来解脱一些人。据他生前回忆,冯牧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尽管有些人并不知道。

正如勃兰克斯所说“文学史就是人的灵魂的历史”,我们正是认识到郭小川日记对于那段历史的参考价值所在,才不惮给前辈“脸上抹黑”之讥,将这样一个文本捧献给读者。

陈徒手的《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一文,以一种史笔的手法写出了那一时期的一些背景情况,我们觉得可以作为这个日记的佐证。征得他的同意,我们将此文收入放在正文之前。

为了忠实于原作,我们完全不作任何删减和修改,作者因当时习惯,用字用词,数字写法等不统一不规范之处,也一律不作更动,只订正了个别明显的错字脱字,订正内容以“〔 〕”表示;少许无法辨认的字和牵涉他人隐私处,以“□”表示。

日记的主要整理工作由郭晓惠担任。

郭小林

2000年2月20日

郭小川：

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

陈徒手

1955 年 8 月，中宣部领导层就酝酿着一个加强中国作协工作的人事安排：从中宣部文艺处负责人林默涵、郭小川之中抽调一个去作协。36 岁的郭小川惶然地表示：我不去，我没有认真搞过文艺，不敢跟那些大作家打交道。9 月 6 日，郭小川在作协反丁陈斗争会上发言，其发言稿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中，认为具有战斗力，当即拍板让郭担任作协秘书长。

在这之前，郭小川曾与刘白羽、林默涵到公安部，参加整理胡风信件的绝密工作，亲手抄录了不少毛泽东的按语。这是他第一次接触高层政治斗争运作的内幕，斗争的神秘感给他留下最深的印象。1999 年 9 月 3 日上午笔者与郭小川的小女儿郭晓惠探望林默涵，林默涵年已 87 岁，记忆已不甚清晰，他只是简单地谈到当年郭的模样：“郭小川是一个漂亮、聪明的小青年，有朝气，有才干，胡乔木、陆定一欣赏他。……他在左派，但他同情（右派）。有自由主义，党性一般。”

到作协不久，郭小川充分显示其快手的特点，起草了不少工作报告和《文艺报》社论。1956 年年底，郭小川刚刚升任作协党组副书记，就被迫接受了一个人人都回避不及的任务：为甄别中的丁

(玲)陈(企霞)问题写结论。在实际接触文艺界的矛盾状态之后,他苦不堪言地躲在家中,光写结论就花费了两三个月,一再形容自己的写作为“蜗牛速度”。

曾任作协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林绍纲当时抽调到丁陈问题甄别调查组,同在组内的还有丁宁、唐达成。林绍纲回忆道:“当年丁陈不服,提出上诉,中宣部、作协就成立了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调查组,张的资格比周扬还老。我们根据1955年发言材料,向一百多位作家进行核实,不少人把原来发言材料中尖锐的、上纲上线的词语抹了。我们把调查的材料打印成册,堆在桌上成了很高的一叠。在这基础上得出结论,丁陈不是反党集团。记得那时由唐达成、丁宁写初稿,然后郭小川一遍遍修改。他熬夜写稿,努力掌握分寸,很苦啊!他改了有六七遍之多,可是每回到中宣部就通不过,郭小川回来就说:‘(稿子)不行,再改。’”(1999年10月21日采访)

在郭小川当时的日记中,写结论的牢骚和苦闷比比皆是,如:“57-1-2,看材料一天,事情之艰难和复杂真是达到严重的程度。”“57-1-11,八时起,就为眼前这件事煎熬着,弄得心情非常之坏,似乎感到这文艺界的混乱状况是没有希望改变的。”“57-2-11,作协的事简直没有完结的时候,四面八方都把我逼住,真是叫人烦恼,我实在不想干下去了。”……写结论的难度在于甄别时作协很多人对于1955年斗争丁陈会议上所提供的材料不认账,中宣部党委又要求摆出充分的事实。郭小川采取折衷的态度,力求使结论能为多数人同意。结果,周扬、邵荃麟、刘白羽、林默涵看后大为不满,周扬尤其对向丁陈“赔礼道歉”的提法耿耿于怀。

当时郭小川在会上无奈地表示,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

摘掉,也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我想不出来。大家为如何措辞一筹莫展,突然有人想出一个“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提法,周扬一听马上认可,并决定由郭小川根据新提法继续修改。郭小川的这一摇摆,始终让周扬、刘白羽他们心中不满,构成了他 1959 年挨批的罪状之一。1959 年刘白羽批他时说到这一点:“小川说他写丁陈结论,是‘慨然应诺’。这不是一个党员的话,我听了这四个字非常难过。这四个字就是说,我们四个人没有写,委屈了小川。要说清楚这点,不能把写丁陈结论看做委屈。那时研究了这个问题,觉得小川写比较合适的……考验一个党员就在变化的时候,有些党员就是要在激烈的战斗时接受任务的。小川在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走向右倾。”(见 1959 年作协会议记录稿)

一份篇幅不长、历经周折的结论草稿,成了 1959 年郭小川受批时很难迈过的一道门坎:

更为严重的是,我写的陈企霞结论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的文件,在那上面,不仅把陈企霞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在末尾还要由组织上向他们道歉。——当时我纠缠在一个奇怪的逻辑上,觉得把肃反对象搞错了,要道歉;既然把宗派主义的错误当做反党集团,也要道歉……所幸周扬同志等审查了这个草稿,马上给以纠正,我当即同意了周扬同志等的意见,我又根据这些意见写了第二遍稿、第三遍稿……现在想来,犹感不寒而慄,这些错误即使我后半生为党工作,也不足以赎罪于万一。(摘自郭小川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作协 12 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的检查原稿)

时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的张僖回忆,写丁陈结论,人家不满

意,小川只能按照别人的意思去改写。他感到作协太复杂了,不愿意呆下去了。

张僖至今还记得郭小川初到作协的情景:“没有架子,待人热情。他不要小车,上下班坚持骑自行车,有一次前闸坏了,摔得鼻青脸肿。”他告诉笔者:“其实,小川在中宣部后期已经很不愉快,有人指责他专搞创作,他感到不被人理解;来作协后,中宣部还是有一些人对他有意见,譬如说他写的诗句‘我号召你们’所流露的自负、在《文艺报》新年漫画《万象更新图》中所表现的骄傲等,在食堂吃饭经常拿这些问题开玩笑似的讽刺他,小川心情不好。他来作协时没有多大名气,人家把他当做工作劳力看待,工作稍不令人满意就有人盯着。当时作协的情况比较复杂,三十年代的矛盾、延安与国统区的矛盾、几个解放区之间的矛盾全带到机关。小川跟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搞不到一块,有些人认为他的思想太右,为丁陈事训他,认为他没有出力。有的人板着脸孔训人训惯了,抓住一点事就批。小川很倔,有时拍桌子去顶。有一次小川和我到王震家,王震说他,‘你这个脾气跟我一样,你记得当年我们拍桌子吵架后怎么叫你,你都不理我……’后来我想,正由于他曾当过王震的秘书,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没有敢动他,否则 1958 年很可能被补划上右派。”(1999 年 8 月 6 日采访)

1958 年 4 月完成丁陈结论稿前后,他离开作协的请求没有获准。

1957 年春天的鸣放带来了诸多的变化,郭小川内心里既困惑又不安:

……看到一些人“闹事”,一些人用反官僚主义之名,行反领导

之实,一些人利用“干预生活”的口号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我便忧心忡忡,害怕这样下去,甚至可能出匈牙利事变……因为怕,因为心虚,我才有时过急地去顶。一面企图顶住反官僚主义的潮流,不满《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个小说,想在自己的作品中“鞭打”我眼前的这些知识分子;一面又在处理丁陈问题上表现妥协,在处理作协的人事纠纷中一再忧虑团结问题,在写《深深的山谷》时对知识分子的情调表现了同情。

……我自己并无明确的“钓鲨鱼”的思想,而且我这时特别强调党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相当严重的,必须整一整。(郭小川一九六七年《在反右派斗争前后——我的初步检查之七》)

在听了毛泽东几次讲话之后,郭小川开始转变了态度,模糊地认为鸣放出毒草来也不要紧,反正是可以锄的。5月3日,主抓运动的刘白羽从外地回来后,马上主张党内党外一起放,郭小川予以赞成。两人常常一起参加各单位的鸣放会,鼓动大家发言。6月1日下午开碰头会,为了出大字报问题争论很久,郭小川坚持把整风小字报和大字报都弄出来,免得使领导陷于被动。有人认为北大学生要闹到街上是一种偏向,而郭小川却表示北大学生的行为基本上是健康的。

在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老诗人臧克家说,别的党员他不敢接近,只有对郭小川可以无话不谈。还有人表示,文艺界党员中只有四个人与党外人士之间没有“墙”,郭小川是其中之一。后来郭小川私下里说,听了这些话以后有些飘飘然。到了1959年批判时,他只能这样承认:“这种流言恰好是我当时和以前所表现的政治上软弱、不敢得罪人等低级趣味的反映。”

在鸣放的日子里,郭小川身居作协决策层,不断听到周扬传来毛泽东的内部指示,亦步亦趋地相随着。他在2月主持召开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讨论会上,基本上否定了这篇引起争议的作品,支持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所提出的某些看法。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后,他又很快同意将王蒙的这篇作品选入《1956年小说选》和推荐到《中国文学》发表。后来他为此检讨说:“我当时思想混乱了,认为自己搞错了,心想,我们真是跟不上吗?其实,主席的意思是放手让毒草出来,放出来再加以扑灭。我误解了主席的指示,思想情绪于是更向右的方向发展。”(摘自郭小川1959年10月24日检查原稿)

郭小川此时显得十分忙碌,他身上那种善于协调、与人为善的特点完全发挥出来。在肃反中被视为“坏分子”的诗人李又然在会上历数周扬、刘白羽的错误,会后郭小川找到李又然做工作,说周、刘虽有缺点,但他们对党是忠诚的、正派的,并且向他解释,陈企霞之所以被隔离,并非是刘白羽的意见,而是冯雪峰的主意。作协机关的一些干部在会上诉苦,讲述生活困难的境况,郭小川听后深表同情,当场就答应予以解决,有的增加生活补贴,有的在会后边吃饭边谈问题。

在这时期,郭小川的胆大与谨慎、外表兴奋与内心疑虑相辅相成:

……我当时实际上是支持《文艺报》放出毒草的,海默曾写一篇咒骂我国文学粉饰现实、主张揭露阴暗面的文章,在整风以前给我看了,认为不能发表。到了整风初期,《文艺报》要放而没有文章,我又请《文艺报》侯金镜去约他把这篇文章的修改稿拿来,准备发表。海默又觉得不对,把文章抽回。

一次,周扬同志在路上碰到我,谈到《文艺报》不应这样乱“放”。我当时回答说:“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不放毒草,二是放了以后再批判。”我实际上是赞成第二个办法的。周扬同志说:“放了会使党受损失。”我这才同意了,并将这一精神告诉《新观察》和《文艺报》。(摘自郭小川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作协 12 级以上党员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原稿)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郭小川怀着极其复杂的兴奋心情写下当晚日记:“愿望实现了。”过了几天,《文艺报》的杨犁在会上对社论有不同看法,郭小川当即严厉地斥责他,制止了他的发言。

郭小川感觉到了政治空气中的凝重,7 月初写下了两首反右派的诗歌,其中一首名为《射出我的第一枪》中写道:“人民啊!我的母亲/我要向你请罪,/我的阶级的眼睛被迷住啦/……在奸人发出第一声狞笑的时候,/我没有举起利剑般的笔,/剖开那肥厚的肚皮,/掏出那毒臭的心脏。”诗人解释说,自己想通过这两首诗来进行自我批评和表示坚决斗争的决心。

在风云变幻之际,诗人想强调的是:“今天,当右派分子还在奋力挣扎的时候,/用我这由于愤怒和惭愧而发抖的笔,/发出我的第一枪。”

时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的黎辛回忆中谈到郭的这种状态:

反右开始后,郭小川斗人是很厉害的。批丁玲时发言很尖锐,发言中有“你该明白,批斗你是主席、中央让的”这样语气。批冯雪峰的假材料不是他造的,但他大声跟着嚷嚷。

周扬用干部一是听话,二是斗争性。当年周扬找到刘白羽说,毛主席抓王实味,是让陈伯达去的;这次抓胡风,要让你去。提拔

郭小川为党组副书记,就看到了他的斗争表现。

斗争我为右派的会上场面乱哄哄的,发言者冲到你面前,踩着地板呱呱直叫,不让你解释,只能认罪。我记得,郭小川的劲头是很大的,说话的语气很厉害,他严厉地说:“黎辛不仅残酷地对待同志,而且还残忍……”(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采访)

从现在保留的郭小川 1959 年 6 月 7 日致刘白羽、严文井的信中,可以看到他远在东北陪同茅盾访问时,还对北京如何斗争黎辛提出了一些看法:“……关于黎辛的材料,使我大为震惊……黎辛恶劣已极,不可等闲视之。必须弄得他无话可说,方会低头,斗争一定会很艰难……”他在信中还说,已鼓励张僖发言,并批评他斗争性太差这个弱点。

信中最重要表态是他检讨了自己的软弱:“这次会议斗争黎辛同志,使我猛醒。两三年来,我精力分散,勇气不足,嗅觉不灵,妥协性太重,个人主义的孽根未除,思想感情还未无产阶级化,教训至深!然而我很长时间并不自觉,现在总算明白了一些,将急起直追,勇往直前,相信是有希望的,可以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无产阶级战士。耿耿此心,仅此一表。”

在这种外力催逼之下,在这样的心态中,郭小川后来批判别人之激烈是很自然的。

反右派斗争很快白热化,郭小川迅速进入角色。从他留下的日记来看,这一时期的繁忙是空前的,他承担了很多幕后的、琐碎的、承上启下的事务性工作。

1957 年 8 月 13 日日记中记载了一次夜间紧急会议:

晚十时半,林默涵突然把我叫到刘白羽处……谈了一下会议

的组织问题,决定把各单位的与会者都及时组织起来,及时告诉他们意图,供给他们材料。

从日记中发现,陈荒煤、沙汀、周立波、郑振铎、任其芳、陈笑雨、邹荻帆等人在批判大会的发言稿大都是郭小川参与组织、督促完成的。在作协楼上办公室,看到陈荒煤、沙汀、周立波正趴在桌上准备发言稿,郭小川把这一场景作为闲笔记入日记。在陈笑雨、邹荻帆的发言草稿中,郭小川还根据当时定下的基调,加入了一段话:“……党委托周扬同志来领导文艺工作,因此反党首先必须反对人——具体的就是周扬等同志……通过周扬同志等体现出来的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一条红线。”

这段话“文革”中被作协造反派斥为“吹捧之极,恶毒之极”。

其实被造反派和郭小川视为最严重的还是他在 1957 年 8 月 20 日第十九次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批判冯雪峰的发言,造反派直接定性为“围攻鲁迅”、“污蔑了鲁迅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

在郭小川“文革”交待的这一问题材料中,周扬和冯雪峰谈话的场面着墨较多:

……真正使我感到惊奇,动了感情的,还是 1957 年 8 月 12 日下午四时,周扬和冯雪峰那一次谈话(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和我参加了这次谈话)。谈毕,我在日记上记着:“四时,与雪峰谈话,周扬谈了许多过去的问题,雪峰从苏区来,马上怀疑周扬,相信胡风;雪峰在重庆住到姚蓬子家里,许多事是敌我不分的;雪峰表示他怕给他加上小集团成员的帽子。”

此外,还记得周扬似乎还指责冯雪峰欺骗了鲁迅,打击了“左联”,搞得他们很困难。说到这时,周扬哭了,这就引起我的同情。我觉得,周扬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多年不说,真不容易。(摘自郭小